

論斯丹达尔的《红与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論斯丹达尔的《紅与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2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8号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978 字數 45,000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2\frac{5}{8}$ 插頁 2

1953年9月北京第1版 195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册

定價 (4) 0.24 元

出版說明

近几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介绍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外国古典作品，不但翻译出版的数量日益增多，译文质量有显著的提高，而且对读者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但是，对于外国文学遗产，也和对于我国文学遗产一样，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接受。而我们过去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却做得还很不够。

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有些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曾经引用某些外国古典作品中的片言只句，企图颠倒黑白，混淆文艺作品的时代背景，宣扬一些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这表明如何分析、研究和批判外国古典文学遗产，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的一个战斗任务。

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同学和青年教师们，为了贯彻党的“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整风后，利用暑假时间，以惊人的干劲，讨论和批判了一些外国古典作品。这本《论斯丹达尔的红与黑》就是他们所获得的成果之一。这是外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创举，值得我们重视。我们相信通过广

大讀者、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文学理論工作者的努力,批判地接受外国古典文学遗产的工作,一定能进一步展开。

本集中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原載《中国青年》1958年第11期,題目是《怎样看待西欧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現經作者改名为《从“紅与黑”看西欧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收集于此。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9月

目 次

《紅与黑》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意义

.....夏 玫 郑克魯 袁樹仁 (1)

張学信 張英倫 邵永和

怎样認識于連·索黑尔.....雷 崇 立(18)

論《紅与黑》中几个人物形象.....赵 隆 勳(34)

从《紅与黑》看西欧古典文学作品中

的爱情描写.....姚 文 元(51)

从于連的个人英雄主义談起

.....祝 曉 瑾 夏 申 夏 廣 芬(64)

斯丹达尔的生平和作品簡介.....陈 占 元(74)

《紅与黑》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意义

夏 玫 郑克魯 袁树仁

张学信 张英倫 邵永和

十九世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說《紅与黑》，在解放前就被介紹到我国来，它在我国拥有不少的讀者，并在青年讀者中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人看了这部小說，更加痛恨貴族、僧侶的庸俗和虛伪，以及資產階級的貪婪与自私，并对被等級制度所扼杀的来自下层的有才能的青年，寄予无限的同情，同时贊揚他們敢于起来反抗的精神，从而鼓舞自己努力創造更美好的将来。但也有些人讀了这部小說以后，錯誤地吸收了其中不健康的東西。如有些青年崇拜于連的个人主义的反抗精神，有的欣賞瑪特儿的玩世不恭，有的把注意力集中在爱情描写上，認為看了爱情部分可以陶冶性情，更有人羡慕貴族豪華的生活和貴夫人的风度。綜上所述，說明了有些讀者对这部政治小說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的認識还不够清楚。同时給西方文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即是要加强对西方古典文学的分析批判，做到使讀者在接受西方古典文学遺產的时候，能够吸其精華，弃其糟粕。

这部政治小說，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法国第二次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主要是查理十世統治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面貌。

1814年3月末，以俄国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俄、奥、普联軍攻入巴黎，不久，拿破侖被迫退位，結束了为时十四年的統治，资产阶級占統治地位的君主政体瓦解了。在联軍的武力庇护之下，波尔旁王朝重新掌握了法国政权，路易十八登上了王位。逃亡的貴族和僧侶也回到法国。貴族和僧侶希望恢复在大革命中失去的财产和特权，便施行了一系列反动的措施。这种恐怖政策在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滿，拿破侖乘机东山再起，一举打回了巴黎。但他的軍队很快就被英、普联軍击潰。波尔旁王朝再度回到法国。第二次王政复辟时期开始了。

路易十八死后，他的弟弟查理十世于1824年即位。查理十世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家伙，他認為只有神授的君主专制政体才是合法的政体，只有天主教才是真正的宗教，只有享有特权的貴族才是值得尊重的阶級。他即位后即頒布了“賠償政治流亡者十亿法郎”的法律和“反宗教过失治罪法”。这两条法律在人民大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憤激。1829年8月，查理十世又命他的寵臣坡里涅克組

閣，这个內閣的所有閣員全属于保王党，是复辟时期最反动的內閣。由于反动措施的加强和經濟危机的影响，國內革命的酝酿日益成熟了。1830年7月26日，国王又頒布了非法的敕令，引起人民更大的憤慨。次日，七月革命爆发了，波尔旁王朝終於結束了它的历史。

复辟时期，反动的封建統治阶级为了恢复并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曾經企图廢除宪章，并想通过外国干涉来对付自由党人和人民，但都没有成功。当时社会上有三个政治派別相互斗争：代表地主和高级僧侶利益的最反动的极端保王党，代表部分官僚、工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党，以及代表工商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自由党主張建立統治权归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提出为资产阶级的人身自由和人权而战，代表了进步的一面。因而同反动的极端保王党产生极尖锐、极激烈和极复杂的矛盾。僧侶和朝廷貴族勾結起来，共同对付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势下，教会势力日益发展，天主教有很大的权势。在查理十世統治时期，傳教士甚至往往身兼秘密偵探的角色，直接干預政治生活，在宗教的黑幕后，干些最卑鄙无耻的勾当。

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在經濟上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样，资产阶级更迫切地要取得政权。但另一方面，城乡劳动者的处境却每况愈下。小农不能保持在革命时期获得的土地，生活很苦。工人阶级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榨

下也是难以生活。但那时工人阶级还未发展成熟，他们进行的斗争，只是捣毁和破坏机器。

总之，复辟时期的法国，封建统治者肆意行暴，贵族和资产阶级充满了荒淫无耻的行径，而人民大众生活在极其悲惨的境地。贵族和教会残忍、伪善而贪婪，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激烈地争夺权政，平民受到极大的压制。第二次复辟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是复杂而尖锐的。1830年的7月革命，就是矛盾的总爆发。

二

《红与黑》是一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政治小说。作者通过主人公于连的悲剧，贯注了他对那个社会的仇恨，揭示了平民同贵族、教会、资产阶级的矛盾，控诉了贵族、教会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谴责了以金钱和门第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对平民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刻的同情。这一切，都激起了人们对那个社会的强烈憎恨。

首先，作者全面地揭露了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并运用文学这个武器来为政治斗争服务。正如本文第一部所分析的，当时的阶级矛盾，一方面存在于劳动人民（包括平民）同贵族、教会及资产阶级之间；另一方面则存在于贵族（保王党）和资产阶级（自由党）之间。贵族和僧侣依靠等级制度，过着穷奢极欲的剥削、寄生的生

活。他們魚肉人民，無惡不作。同時資產階級也大發橫財。可是平民呢？由於等級制度的限制，由於種種剝削和迫害，日趨貧窮和破產。書中通過主人公于連個人奮鬥的失敗，反映了平民在那個社會里備受壓迫的處境，表明在反動社會制度下，即使象于連這樣很有才能的人，也是走投無路的。我們認為，于連是那時代的平民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他的身上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要求（取消等級制度、個性解放等），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下層人民的願望。這是符合當時歷史進程的要求的，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他的個人英雄主義、利己主義，也使我們看清了資產階級的丑惡本質。他的悲劇說明個人奮鬥不能改變社會制度的性質，說明個人的解放和幸福只有依靠集体的鬥爭才能實現。

資產階級（自由黨）同貴族、教會（保王黨）之間的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充滿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正象德·拉·木爾侯爵所說：“唯有死鬥而已。”德·瑞那先生（保王黨）由於大資產階級“如飢如渴地想取得政權”，不得不把一個從未騎過馬的親信幕僚，來充任歡迎皇帝的儀仗隊的統領。甚至德·瑞那先生搶聘于連當家庭教師，也是為了壯旺列諾這些資產者“瞧瞧顏色”。這裡，我們看到了十九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在工業蓬勃發展並大發橫財之後，迫切地渴望奪取政權，因而引起與貴族僧侶針鋒相對的尖銳鬥爭。

斯丹达尔深刻地揭露了貴族階級的冷酷无情，虛偽欺詐和腐朽反动，这一切都表現在对德·拉·木尔侯爵的刻划上。德·拉·木尔侯爵是怎样一个人呢？可以說，他是反动透頂的貴族階級的代表。从書上我們可以看到德·拉·木尔侯爵是那次秘密會議的主要組織人之一。在会上，他提出了借用外国軍隊来实现反动阴谋的主張。“五十年以后，在欧洲只有共和国的大總統，沒有国王了。”“朝廷、教会和貴族，明天都会消灭。”他是意識到了貴族階級必然要死亡的，但出于沒落階級的本能，他仍千方百計地作垂死的掙扎，甚至卑劣到用出卖民族利益的办法去求得外国軍隊来鎮压人民。他說：“你們会說这件事情很艰难。但是我們的头是值得这个代价的，在言論自由，和我們貴族制度的存在，两者当中，唯有死斗而已。”“唯有死斗而已”，他的仇恨多么坚决。这个“温文有礼”的反动統治者的画皮全部揭去，原形毕露了。

讀者或許还记得侯爵的家庭里森严的气氛；只在危急的时候，那里才会談論政治：“只要不譏笑上帝、教士、国王、有地位的人、朝廷保护下的艺术家，或者每一件已經承認了的东西；只要不贊美貝朗瑞、反对派报纸、服尔德、卢梭，和一切胆敢說一点直話的人，人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談論一切了。”德·拉·木尔侯爵是多么忠实地維持反动統治階級的利益呀！在这个家庭里，一切自由进步思想和言論，都是与这种森严的气氛不相容的，誰也不

能打破这种空气。在这个由德·拉·木尔侯爵一手建立起来的小王国里，我們看到了最彻底、最反动和最沒落的貴族統治。

分析了德·拉·木尔侯爵的本質以后，現在我們再来看他对于連和瑪特儿的婚姻所使用的阴謀手段，就很清楚了。主宰着他的是貴族的阶级本能和等級观念。他認為貧穷就是卑賤，他認為一个平民和一个貴族小姐結婚簡直是褻瀆了神圣。与其說他是势利鬼，毋宁說他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忠心耿耿的維護者。他絕不能放弃他的女儿取得公爵夫人头衔的希望。于是他采取最卑鄙无耻的手段，通过神父，借德·瑞那夫人的手，写了一封中伤誹謗于連的告密信，因此造成了于連的悲劇。于連的失敗和死亡，正是这些貴族所拍手称快的事。这和侯爵当初重用于連，甚至把傳達秘密會議記錄的“重任”交給他的做法，是极鮮明的对照，也是对貴族的深刻揭露。侯爵重用于連，目的只在託于連为他的阶级忠誠服务，一旦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把他无情地毁灭了。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在《紅与黑》里得到了活生生的反映。通过这一典型形象的描写，作者戳穿了貴族阶级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紗幕，无情地鞭撻了貴族阶级反动丑恶的本質。

斯丹达尔在这部作品里，明显地表現了他的政治傾向性。这就是他对貴族、宗教和大资产阶级等人民的敌人作了全盘否定，而对平民代表人物于連則寄与了深厚的

同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自觉地举起文学武器打击他的敌人。他俏皮地制造了他本人跟一个出版商的谈话，表明了这一点：“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他把本书副标题题为“1830年纪事”，都说明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

在关于秘密会议的描写中，作者无情地暴露了当时贵族和教会的无耻嘴脸，暴露了他们梦想借外国武装干涉来恢复绝对君权制度的阴谋。作者不能不写得含蓄些，因此他借用几十年前有过的一次类似的会议来影射这个阴谋，并在德·那伐尔公爵这个人物身上刻划了查理十世的宠臣茹尔·波里涅克的形象。所以第52、53章比较难懂，但应该说，这两章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一部分，这里充分地表现了文学的功能。

斯丹达尔对天主教会作了淋漓尽致的暴露。斯丹达尔本人是个无神论者，可以说，他对披着宗教黑色法衣干无耻勾当的教会是深恶痛绝的。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在《红与黑》里得到了佐证。于连囚在牢狱里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真的！如果我遇见信徒们的天主，我便完了。他是一位暴君，因此他充满了复仇的意念；他的《圣经》只叙述一些残暴的惩罚。”与其说这是于连个人的愤恨，还不如说这是作者对天主教会罪恶的控诉；对天主教会一个强烈的宣战。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里，天主教会是直接干预政

治和監視人民思想的統治人民的工具。書上有這樣一句話：“在他們（人民）的眼睛里，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政府；可是政府还没有真实的合法的权力，除非是凭借天主教派在地上的神父的力量。”加斯答列神父更教导他的学生做一根教皇手里的棍子。这说明了天主教会在政治上势力之大。这些非常露骨的话，的确道出了教会和反动政权之间的非常密切的关系：教会实际上就是反动政府统治人民的一根棍子。当于連未到神学院之前，西朗教士就常常对他这样说起：“这地方（指神学院）充满了秘密的偵探同各式各样的坏人。”于連并不以此为意，但是到了神学院以后，这种事果然发生了：一个姑娘给他的地址——这张纸条藏在他的箱子底下——被加斯答列神父的偵探偷走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士在“仁义道德”的谎言下面，合法地充当了一个多么卑鄙的騙子手的角色！与其說神学院是一座监牢，还不如說这是一个真正的特务养成所。

天主教会的黑暗、虛伪以及对人們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摧殘，在神学院的描写里得到了充分的揭露。我們看到，神学院里面充塞着阴森可怖、麻木不仁、猜疑嫉妬的空气。当于連走进神学院的时候，便仿佛有一种置身在一个黑洞洞的冰窖里的感觉，这預示着神学院的黑暗无比。到神学院里来的乡下人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獄里，他們的脑袋不断地被灌輸着对地位对金錢比之于对上帝

更虔誠更崇拜的思想。加斯答列神父說：“神父是最好的差事了。”而且对学生大談特談他的山地教区能得到多少鸡多少钱。这里我們又可以看到，金錢、地位，这就是教士神父所梦寐以求的，他們显然都是些不折不扣的拜金主义者。然而表面上他們却信奉着这些箴言：“把六十年的苦修苦练，和天堂的永恒的欢乐或地獄的沸騰油鍋的永恒的痛苦，放在天平上称一称，算得什么！”这岂不是一些对宗教教义阳奉阴違的伪善者的語言嗎？宗教教义的虛伪，到此是暴露无遺了。

讀者或許还記得貝尙松的大主教，这个人表面上象是挺和善挺仁慈的吧。的确，他不同于一般的教士神父，但这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別看他外表慈善，这正是他毒狠的地方。如《牛虻》里的紅衣主教蒙泰尼里，就是这一类口蜜腹剑的人。他用这种小恩小惠的方法，为的是誘惑人民——在这儿是誘惑于連，使这个有才能的青年，替他們服务。他对于連說：“年輕人，如果你老老实实，有一天我会把我管轄区内最好的教区給了你，……不过，你得老实。”他叫于連老实，就是要叫于連象羔羊似地听命于他，为他（宗教）服务。我們看的时候，不要为这个大主教的外表一套所迷惑，而應該看穿他阴險虛伪的內在本質。

于連在神学院里，精神和思想上都受到极度的摧殘。他“每分鐘都在假冒为善”，整日苦心孤詣地“为的是

要得着那副显出盲目的热烈的虔信的面容，准备完全信仰和完全受苦。”看到这里，我們仿佛听到斯丹达尔憤怒的正义的譴責，他把自己的作品化为投枪匕首，給了教会一个致命的打击。

如果說，在十九世紀，宗教已經成为統治階級压迫奴役人民的工具的話，那末在二十世紀的时代，宗教的这种作用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就更其变本加厉了；而它的反动性也达到了頂点。因而斯丹达尔的《紅与黑》彻底地暴露了宗教和教会的反动这一点，在今天对我們來說，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斯丹达尔在《紅与黑》这本书里，揭露的矛头不仅指向黑暗的教会、貴族，罪恶的封建等級制度，同时也指向資产階級。作者无情地揭露了資产階級的利欲熏心和貪得无厌。“‘有利可图’这句话就决定了維立叶尔的一切。”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金錢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了。”为了錢，家庭、名誉，連起碼的人的尊严都可抛在一边，这些都充分反映在作者对德·瑞那先生的刻划上：“这个人的才能，我們可以断定，他只能办到严格地收討他人的欠債，当他自己欠人家的債时，他愈迟还愈好。”他的才能仅在于搜刮錢財，可見这人是爱錢如命的。事实上，在德·瑞那先生看来，一切疑難問題也只要有錢就可以解决。